

拉美政治

拉美的“民粹主义”： 争议、特征及比较研究的局限

[阿根廷] 古斯塔沃·桑蒂连

内容提要：拉美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运动，它植根于地区主要经济体的结构中。拉美民粹主义是对这些经济体双重特征的回应：一战之后拉美开始了早期的工业化进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工业化进程加速，与此同时，面向国外市场的农业和矿生产也同步发展，这一结构特征有助于解释民粹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局限性。拉美三国民粹主义的情况存在重要差异。在阿根廷，民粹主义运动更多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参与，至今正义党仍然是一个经常参与选举的基础广泛的群众组织。在墨西哥，虽然民粹主义很早就已经形成并在农民革命爆发之后持激进立场，但无论城市社会力量的组织结构还是农村地主阶层的反对之声都比较弱，从而使得革命制度党保持了长时期的垄断地位。在巴西，工人阶级运动与政权的关系较弱，这意味着该国的民粹主义在发端之时比前两国更为专制，其结果是1954年以后巴西民粹主义的政治遗产显得微不足道。

关键词：民粹主义 工业化 革命制度党 瓦加斯 庇隆

作者简介：古斯塔沃·桑蒂连，阿根廷国家科技委员会文化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国立科尔多瓦大学亚洲现代史与社会政治史教授。

中图分类号：D7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18) 01-0116-17

本文标题中的“民粹主义”（populism）一词之所以加了引号，原因在于，尽管19世纪下半叶俄国的“革命民粹主义”（narodnik）运动中有意识地构建了这一概念，之后美国的“平民党”（Populist Party）也用该词为本党命名，但后来对这一概念的描述变得模糊，这个概念成为一类泛指的理论类别，它甚至涵盖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运动。^① 在当今的北美和欧洲政治中，民粹主义也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② 也有人将民粹主义和毛主义联系起来。^③

由于“民粹主义”一词涵盖面广、语意模糊，本文姑且继续将该词视为一个概念，用来探讨拉美的民粹主义是否存在？其特征是什么？在研究历史上特定的民粹主义现象时，应从哪些方面进行比较？为回答以上问题，本文将研究三个案例：（1）第一届和第二届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阿根廷（1946—1955年）；（2）瓦加斯总统执政时的巴西（1930—1945年，1951—1954年）；（3）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时的墨西哥（1934—1940年）。我们将讨论每个案例中反映的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民粹主义所受的结构性的限制（经济方面），批判性地分析一些其他学者提出的跨国比较以及不同民粹主义政党的特点。

一 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

拉美民粹主义的起源应追溯到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促使拉美国家政府开始干预经济，从而涌现了新生的工业部门，而占主导地位的农业部门则以出口为导向。^④ 在19世纪的拉美，外国移民大量涌入各地的城市和农村，而在1929年危机之后，从农村前往城市的移民大幅增加，这些新的工人在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中就业。

然而，拉美上述进程并没有产生强大、自觉的民族工业资产阶级。原因在于，自19世纪末工业实业家的诞生起，他们就一直与贸易、金融和农业等

^① Stanley Payne, *A History of Fascism, 1914 - 1945*,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② Daniele 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eds.), *Twenty - 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New York: Palgrave - MacMillan, 2014.

^③ Maurice Meisner, *La China de Mao y Después: Una Historia d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órdoba: Comunicarte, 2007; Joseph William, *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在阿根廷和巴西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使得用于替代进口的轻工业得以发展。在阿根廷，这形成了激进公民联盟党上台执政（1916—1930年）的背景，有人认为该党应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前兆。在激进党执政时期，国家尤其是军队尝试同时推进经济规划和国有化战略行业。

传统经济活动保持紧密联系。这意味着，首先，如果新型经济活动（即工业）的发展势头好，那么企业界就会建设工厂，扩大其投资领域。建厂的初始资本可以来自海外贸易收入、精英控股的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可以来自根基深厚的农业经营；但如果工业的利润下降，商人的直接应对措施就是收购土地或开发新的农业项目。这一特征对经济和技术的影响深远：资产阶级和传统精英之间联系广泛，使得这类社会联系能长久延续，但却未能形成更为可持续的发展路径，因为那需要另一种社会管理和市场环境的框架模式。此外，在宏观经济方面，这种“由天生优势促成财富积累”的社会现象，使得精英一直对“技术创造财富的重要性”一无所知。在20世纪初，由于资产阶级高度同质化，使得拉美本土所有的大型公司都不愿采纳技术变革，无论公司所处的行业是铁路、农业还是工业。

其次，这个业已存在的、多样化的社会阶层与保守党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企业商会在19世纪末已经完善，而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拉美三大经济体中，阿根廷再次成为这一现象表现得最为明显的地方。具体而言，商业大亨控制了阿根廷工业联盟（UIA），该机构的特点颇为微妙，它诞生在工业企业出现之前，而且因为成立早，它将自己视为工业界的行业发言人。阿根廷工业联盟致力于维持工业界，有如关心自己孩子并试图掌控其成长方向的母亲。工业界的商业人士的行业组织形式自上而下，而最顶端是19世纪末期出现的业内大亨，他们精心地掌控着这一组织。^①

巴西的经济发展进程也类似。首先，商业资本早在工业资本出现前就已存在。“要理解主要工业企业集团的起源，可用商业资本转为工业资本来解释……特别是以出口和进口为中心的大型贸易。”^② 其次是“地主、农业出口商、工业企业家之间的共生现象，许多工业企业家的出身都是地主阶级，或是与出口行业存在联系的阶级”^③。然而，1929年爆发了全球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围绕咖啡出口的方兴未艾的城市经济，这即是瓦加斯总统（任期为1930—1945年）上台时的背景。

^① Jorge Schwarzer, *La Industria que Supimos Consegur: Una Historia Político - social de la Industri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6.

^② Marina Gusmão de Mendonça and Marcos Cordeiro Pires, *Formação Económica do Brasil*, Sao Paulo: Thompson Learning Ltd., 2002.

^③ Vania Bambirra and Theotonio Dos Santos, “Brasil: Nacionalismo, Populismo y Dictadura. 50 Años de Crisis Social”, en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América Latina: Historia de Medio Siglo*, México D. F.: Siglo XXI, 1977, pp. 129 - 177.

墨西哥也发生了类似的故事，在1910—1911年革命爆发前，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来源是农业和商业领域，但墨西哥的经历有些独特之处值得一提。首先，“土著土地公有”的社会制度对其国家政策有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在波菲里奥·迪亚斯（1876—1910年）担任政治领袖时，政府实行了经济现代化，其中包括没收公有土地并将其私有化。当时，农业庄园立刻做出反应，针对世界市场来调整其生产模式，而这一政策导致了农业庄园这一经济组织的加强。因此，农业加工业在此期间得以蓬勃发展，主要的出口商品包括棉花、龙舌兰、橡胶、糖、咖啡。从这一点来说，民众的革命情绪可追溯到国家现代化政策制造的社会不满。其次，19世纪末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并不均衡：在全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土地公有和小农经营的经济形式仍然得以延续。另外，墨西哥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出现全国性的地主阶级，各地的地主势力仍主要关注地方事务。再次，考虑到墨西哥与美国经济距离近、融合度深，墨西哥与阿根廷、巴西两国不一样。墨西哥直接受到美国势力范围的影响，美国工商业和金融资本更早更深入地渗透到该国的经济中。这批美国资本与墨西哥的政府和地主阶级有一定联系（这与英国资本在阿根廷的情况类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但美国的经济利益集团必须同欧洲的利益集团争夺对墨的影响力。因此，波菲里奥·迪亚斯领导的墨西哥政府在美国、法国、英国的经济利益之间游离，这种政策影响了这一时期墨西哥的派系政治。国家机构中的派系政治反映为不同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相互竞争、试图对政治施加影响。这与阿根廷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比：阿根廷的地方统治阶级构成了一个坚实紧凑的社会集团。^①

在革命前，墨西哥的经济势力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两个例子表现出来。第一个例子是墨西哥北部奇瓦瓦州州长路易斯·特拉萨斯的发迹之路。特拉萨斯出身低下，在19世纪中期因没收国家和教会的土地而获利。从那时起，他与女婿恩里克·克雷尔合作，借助英国资本成功地开展了农业和石油业务，因为他在墨西哥银行和伦敦银行里均有股份。特拉萨斯与英国资本的合作最终形成了鹰牌（Águila）墨西哥石油公司（AMC）。特拉萨斯和克雷尔与迪亚斯政府内阁中的年轻自由派有政治联系，这一派被称为“科学家”，因为他们奉行实证主义，在政治上亲欧洲。“科学家”派系由波菲里奥·迪亚斯

^① 由于阿根廷和英国的经济关系紧密，这一社会集团也相应紧凑。对英国的依赖程度决定了阿根廷不曾依靠公开市场的状况来进行买卖交易，它的“开放程度”只是单方向的。

个人培养并完全效忠于他。在墨西哥革命爆发的前夜，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向墨西哥石油公司提起经济纠纷诉讼，索赔条款颇为苛刻。第二个例子是第一任革命总统古斯塔夫·马德罗（1911—1913年），他是地区级的地主和工商界大亨。马德罗在北部科阿胡拉州的农民面前表现得像仁慈的家长，因此，他不太担心在这个州可能爆发社会动荡而危及其财产。与此同时，马德罗被逐出了墨西哥政治的核心，这成为他以武力反对迪亚斯的背景。由于墨西哥北部和南部的农民给予了他决定性的支持，使得这场战争成功地结束了迪亚斯政权（农民领袖中名声最为狼藉的领导人包括弗朗西斯科·维拉、帕斯夸尔·奥罗斯科、艾米利亚诺·萨帕塔）。

在理解了以上的分析后，我们便能试着了解之后爆发的墨西哥革命中三个问题的重要性：与美国的关系、农村土地财产、对石油资源的控制。这一社会经济背景又可以解释卡德纳斯总统的早期激进民粹主义。^①

让我们回顾阿根廷的情况。在1929年经济危机之前，根基牢固的社会精英阶级在阿根廷全国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这与墨西哥形成鲜明对比，而阿根廷的社会政治日常生活则是体现这一点的绝佳例子。具体来说，在阿根廷，工业大亨拥有大型企业集团，而传统精英与他们在同一领域里共存，两者在权力圈子、俱乐部及其他社会机构中聚集，相互分享经验和关注点。他们大多常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很容易彼此接触和融合，并减少了潜在的冲突。由于寡头成员人数少，他们更希望住在几个相邻的街区里，尽量减少相互之间的异议，从而将不同精英群体打造成一股同质的政治力量。^②

这里的关键词是寡头政治。随着时间推移，寡头不仅成为一个学术概念，也成为民粹主义政策随后号召要打倒的敌人。在民粹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寡头政治与人民是二元对立的，而人民的代表则应是民粹主义政权。^③ 1929年经济危机之后，这套社会框架在以上三国同时陷入危机。因此，国家必须接管经济的方向，推进工业发展，更重要的是为新经济活动中雇佣的工人提供社会保护。

^① Jean Meyer, “México: Revolución y Reconstrucción en los Años Veinte”, en Leslie Bethell,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Barcelona: Crítica, v. 9, 1992, pp. 146 - 180.

^② Jorge Schvarzer, *La Industria que Supimos Conseguir: Una Historia Político-social de la Industri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Planeta, 1996, pp. 151 - 152.

^③ 拉克劳在其著作中分析了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我们在本文中关注的是拉美民粹主义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Ernesto Laclau, *La Razón Populista*,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05; Ernesto Laclau, *Los Fundamentos Discursivos de la Sociedad*, Buenos Aires: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2014.

在阿根廷，保守党政府于1930年上台^①，在1933—1943年之间开始了民粹主义过程^②。新的经济政策包括由国家管控对外贸易的资源、确定初级出口产品的最低价格、提高关税，但出台这些政策并没有破坏阿根廷与英国之间的特殊经济关系。首先，通过外贸获得的外汇将汇总到中央政府，主要用于支付外债的本金和利息、从英国进口商品、支付英国企业在阿根廷国内经营所获得的利润。此外，利益集团也游说呼吁这一计划不要对其造成太大负面影响。其次，政府的目的是有限的。正如当时最有名的经济部长费德里科·皮内多在1940年说的：“国家的经济生活围绕着出口贸易这个巨大的主齿轮转动，我们现在的情况不允许撤换这个主轮，而只允许我们在这一机制的旁边造出一些小的齿轮，允许一定的财富流通，进行一定的经济活动。”^③“我们不认为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是可行的，也不认为改变是容易的。我们不想让经济完全自给自足。我完全不想回归到所谓的‘我国的农业本质’……我们的目标不是在全国实现完整的大规模工业化，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发展一些完全正常的工业生产，这类生产的正常程度就如同在沟槽中播种种子来生产小麦，或者让牲畜在牧场上吃草来生产肉类。”^④尽管工业发展的目标设定有限，但20世纪30年代阿根廷工业生产的增长仍令人惊叹：1935—1939年短短四年间制造业增长超过40%，增幅远高于1914—1935年期间。^⑤再次，尽管这一时期阿根廷人均GDP增长率纪录良好，但新经济政策实施的同时也出现了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大多数人口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活水平有所降低。对于这种社会经济趋势，阿根廷工业联盟的态度表现为：工业资产阶级系统性地反对劳工工作条件的任何改善。直到1943年军事政变之后，国家才设法完善了对工人的社会保护。这得益于业已存在的强有力的工人阶级组织，尽管这一组织仅出现在政治制度的边缘，且曾在保守党执政的政治周期中受到国

① 阿根廷保守党政府于1930年9月通过政变上台，政变推翻了激进公民联盟主导的伊波利托·伊里戈延政府。新政府一开始由何塞·费利克斯·乌里布鲁（José Félix Uriburu）将军主导，他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1932年，乌里布鲁的位子被阿古斯丁·佩德罗·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将军接替，他遵循传统的保守主义方式来管理国家。胡斯托政权举办了数次假选举，保证国家政务按旧的方式运作，直至1943年发生了一场新政变。这场政变上台的军政府即是庇隆主义的前任。

② Miguel Murmis and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studios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Peronismo*, Buenos Aires: Siglo XXI, 1971, pp. 33–42.

③ Alejandro Rofman and Luis Alberto Romero, *Sistema Socioeconómico y Estructura Regional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1997, pp. 160.

④⑤ Miguel Murmis and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studios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Peronismo*, Buenos Aires: Siglo XXI, 1971, p. 48

家机器的严重压制。在实行民粹主义政策之前，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增长过程并未伴随着社会干预，这种情况导致工人的利益诉求在数量上增加，但工会未能成功解决问题，直到1944—1946年间国家才通过明确政策开始寻求解决方案，从而扭转了国家收入分配的演变趋势。在这一基础上，大多数工会明确表示与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形成联盟，但在结盟过程中他们非但没有放弃其自主权，反而加强了其传统的自主权以及独立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性。^①

在巴西，工人阶级运动出现得较晚，影响也较小。它最初受到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1906—1924年）的影响，也曾短暂被共产主义所控制（1924—1935年），最后被纳入了瓦加斯“新国家体制”的结构框架，但当时瓦加斯深受法西斯社团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随后，瓦加斯公布了其“新国家体制”的宪法修订和社会政治工作，旨在以社团主义来组织和运作巴西社会。^②在这一框架内，瓦加斯于1935年镇压了巴西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并在此之后颁布了关于建立劳工保护和社会保障的法律。同时，他组织了忠于自己的工会组织，解散了曾参与1935年起义的巴西工会联合会，并禁止了该国的所有政党，禁令延续到1945年他创立巴西劳工党（PTB）之时。

巴西与阿根廷的不同之处在于，巴西不仅压制政党活动（在立宪政府治下的阿根廷，正式的多党民主一直存在），而且瓦加斯在即将被军队赶下台之前才组织了民粹主义政党。阿根廷的情况则与之相反。我们即将看到，庇隆主义运动能与阿根廷工会划清界限，并且当其还在巩固其国家领导地位时，就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政党。

在墨西哥，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920—1924年）担任总统时墨西哥劳工已经被组织起来，因此很快便成为一股相关的政治力量，被纳入国家运动和革命运动中。1919年，在国家革命党（1929—1938年，后改名为墨西哥革命党）还未成立之前，支持奥夫雷贡的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CROM）就建立了墨西哥劳工党（PLM），使得奥夫雷贡能以劳工党候选人的身份竞选总统。随后，普鲁塔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担任总统（1924—1928年），他担任总统的任期对工人运动和国家关系的未来非常重要。原因在于，卡列斯不仅成立了革命党，还促进了社会立法，直至1928年他不再允许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参与政府为止。这个事件恰好与墨西哥革命的“制度化”进程相

^① Miguel Murmis and Juan Carlos Portantiero, *Estudios Sobre los Orígenes del Peronismo*, Buenos Aires: Siglo XXI, 1971, pp. 76–77.

^② 这一论述仅与国家意识形态和制宪项目有联系。例如，虽然巴西有这种倾向，但瓦加斯政府仍在二战中站在同盟国一边。

吻合，而国家革命党的创立则是制度化的体现。从那时起到卡德纳斯总统执政，工会组织力量一直薄弱，他们在如何处理与政权的关系上意见分裂。与阿根廷和巴西的情况相比，墨西哥工人阶级运动经历了不同的政治起伏，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墨西哥的人口仍然以农民为主，工人阶级仅仅是少数，而且，1929年的危机对工会和国家的关系而言更像是一场艰巨的挑战，而并非是一次机会。在卡德纳斯总统执政期间，工人运动能在墨西哥工人联合会（CTM）领导下得以重新组织，该组织取代了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更确切地说，是墨西哥工人和农民联合会，墨西哥区域工人联合会已成为其一部分）。虽然墨西哥工人联合会得以统一，但新的工人联合会内部又爆发了路线斗争。总统不得不介入墨西哥工人联合会的首届大会，支持与农民运动相关的一个派别，以迫使工人联合会支持该派别的提议。^①

总而言之，在拉美三个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三种不同的民粹主义形式。巴西的民粹主义形式是瓦加斯的独裁政权，这个政权最初依靠咖啡行业的寡头，随后迅速地加强了国家的社会拥护基础（这一过程中与劳工组织爆发过多次暴力冲突），并落实了工业主义政策，而该政策最终让瓦加斯领导层失去了其社会和地区支持的源泉。在墨西哥，民粹主义的形式是激进的、“准社会主义”的，由革命党和军队实施，而当时墨西哥社会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和石油问题。在这两国的例子中，劳工的参与度都比阿根廷低。在阿根廷，国家传统上对强大的工人运动抱有敌意，而胡安·多明戈·庇隆（1946—1955年，1973—1974年）抓住机会，将阿根廷全国总工会（CGT）变成“正义党运动的支柱”，从那时起工人组织就受召组织了起来^②。正如我们在这次简短回顾中所看到的，这三个例子里，中产阶级在民粹主义运动中参与度都很低，其社会力量和政治表达都微不足道。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政策的方向，同时也标志着拉美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民粹主义无法完成该地区的工业化。

二 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反对民粹主义的最初原因

民粹主义面临的结构性限制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拉美地区，当自

^① Jean Meyer, “México: Revolución y Reconstrucción en los Años Veinte”, en Leslie Bethell,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Barcelona: Crítica, v. 9, 1992, pp. 147 - 174.

^② Julio Godio,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Corregidor, 2 vols, 2000, p. 891.

由党和保守党执政时，“民粹主义”更像一句嘲讽之语，而不是一个有效的概念。拉美民粹主义政权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遇到“瓶颈”困难。在此之前，拉美国家的经济政策是以两大支柱为导向来发展工业：一是国家实施再分配政策，保证工人实际工资持续上涨，旨在扩大国内消费品市场；二是国家控制外汇资源以投资战略性产业。阿根廷的做法可例证这些政策。庇隆主义政府设立了阿根廷贸易促进研究所（IAPI），该所集中了由农业出口积累的外汇资源，目的是将这些资源转移到工业投资，以差价汇率的方式将外汇（美元）卖给工业进口商。^①这一资源分配方式扭转了前十年国家所采用的自由主义逻辑。在巴西，瓦加斯政府实施了类似的政策，其方式是所谓的“外汇征收”：国家补贴咖啡出口业，并将出口销售的收入集中起来，并像阿根廷一样使用这些外汇来为工业购买原材料和资本品。^②

然而，这一政策导致民粹主义政权在关键时期遭受削弱，原因如下。第一，执政党在两股势力之间仅能维系微弱的平衡，一边是政治精英、工人阶级以及孱弱的城市小资产阶级，而另一边是传统的根基深厚的统治阶级。民粹主义制度从来没有消除这些统治阶级的社会实权，反而更多地依靠农产品出口所提供的外汇。这正是班博拉和多斯桑托斯所说的“外国资本积累过程”，即资本品行业处于拉美各经济体运行之外。^③第二，更重要的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开始复苏，美国和西欧的跨国公司给拉美带来的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来源。从那时起，其他的政治力量在整个拉美地区逐渐积累实力，在有些地区，最终导致了美国政府支持的军事政变。在阿根廷，庇隆于1955年被军事政变推翻。在巴西，瓦加斯总统于1954年在其第二个任期内自杀；几个月后，继任的副总统若昂·卡费·菲尔霍被军方推翻。之后，巴西的制宪政府在1961年和1964年两度遭到中断。在阿根廷，军事政变在1958年、1962年、1966年、1966年数次重演。

^① Alejandro Rofman and Luis Alberto Romero, *Sistema Socioeconómico y Estructura Regional en la Argentin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1997, pp. 165-188.

^② Vania Bambirra and Theotonio Dos Santos, “Brasil: Nacionalismo, Populismo y Dictadura. 50 Años de Crisis Social”, en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América Latina: Historia de Medio Siglo*, México D. F.: Siglo XXI, 1977, p. 140.

^③ 这是过度简化了：尽管这些拉美国家存在这些结构问题，政府还是在当时完成了许多重大项目。统观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3国，就能发现当时很多行业被国有化或被管制，如石油和能源、钢铁、铁路和公路，等等。

墨西哥再次成为例外，其政治进程完全掌控在革命党的结构之内。墨西哥执政党自身主导了退出民粹主义政策的过程，这一过程始于卡马乔总统（1940—1946年），他将墨西哥革命党改名为革命制度党（PRI）。从1954年起，在阿道夫·鲁伊斯·科尔蒂内斯担任总统期间（1952—1958年）启动了经济政策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货币贬值、偿还外债、价格控制和工资管控、外汇交易的自由化，但改革推进的步伐相对较慢。然而，政府奉行了激进的产业政策，增加了国有企业的数量，使得国有企业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民粹主义政策在墨西哥完全退出的时间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古斯塔沃·迪亚斯·奥尔达斯总统的任期内（1964—1970年），当时执政党对社会上的反对派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1982年，在总统换届选举之际，墨西哥爆发了债务危机。^①

阿根廷在自称为“解放革命”（1955—1958年）的军政府期间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政府减少了对外资的管制，冻结了工资上涨。这些政策虽然是由军政府突然颁布的，但主要是为了应对庇隆第二任期（1952—1955年）中出现的经济困难。当时，庇隆主义政府通过的“二五”计划（1952—1955年）包括：逆转阿根廷贸易促进研究所采用的汇率政策，以保护处于衰退中的农业出口；与美国达成战略和解（包括向美国公司开放油田勘探）；构建涉及工会和企业界的“社会契约”，确定价格、福利及工资标准。后来，阿图罗·弗隆迪西总统在任期内（1955—1958年）制定了新的经济政策“发展主义”（Desarrollismo），其目标是修订“进口替代”政策，旨在进一步提高进口替代：在国内生产资产品和中间产品以代替进口。有人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吸引外商，让他们投资于本国工业。不用说，这种政策完全配合了跨国公司和全球资本流动的再次扩张。^②

在巴西，卡费·菲尔霍担任总统的时间虽然短暂，但他仍颁布了紧缩性的经济政策，其中包括控制财政赤字、减少工业补贴、实行信贷紧缩和货币开放。这些新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减少通货膨胀，应对国际市场上咖啡价格的下跌，因为此时咖啡仍是巴西经济的主要出口产品。同时，新的经济政策符

^① John Womack, “La Revolución Mexicana (1910 - 1920)”, en Leslie Bethell (ed.), *Historia de América Latina*, Barcelona: Crítica, v. 9, 1992, pp. 78 - 79.

^② Gustavo Santillán, “O Modelo de Substituição de Importações na Argentina”, en Marina Gusmão de Mendonça and Marcos Cordeiro Pires (eds.), *Formação Econômica da América Latina*, Sao Paulo: LCTE Editora, 2012, pp. 318 - 320.

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结构调整方案。^①

民粹主义之后的政治势力实施了以下的经济方案：货币大幅贬值、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冻结工资、调整产业结构。这些计划背后的目的是减少政府开支，以比较优势促进出口，吸引外商投资工业。继而，民粹主义政府被追责曾“不负责任”地管理经济，它们曾带来的经济增长被视为不可持续、不真实的生长。在新的经济事务中，阶级歧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指责“民粹主义”政府不负责任的同时，也将工人阶级的消费增长作为其相关罪证之一。不过，后民粹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必须放在更广泛的外部背景下讨论：这些政策也是国家对拉美出口的农产品价格下降的反应。这种下降本身是世界经济结构性趋势，这一趋势从1954年开始变得更加清晰。^② 随着二战后美国和西欧的经济产业复苏，这些后民粹主义经济政策也随之形成。

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推翻民粹主义政权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动荡，而且，正如上文所述，军事政变卷土重来。随着产业工人阶级组织的巩固，奉行民粹主义的联盟似乎已成为稳定该地区的重要社会力量，唯一能取代它们的方式是对这些联盟使用武力。

三 什么是合理的比较对象？

鉴于拉美民粹主义的上述特征，我们应该问道：如要对这种现象找到合理的比较对象，应该考虑到哪些因素？前文提到了一些常见的、典型的比较对象，如法西斯主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在拉美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是不可持续的。虽然一些民粹主义领袖的意识形态受到了法西斯主义的渗透（墨西哥再次属于例外），但历史上法西斯主义运动是帝国主义相互争吵的副产品。此外，每一个欧洲法西斯政权都希望扩大国家领土（德国、意大利、日本）或维护其殖民统治地位（西班牙、葡萄牙）。与此相反，拉美大陆的国家^③在国际上处于依附地位，这就限制了民粹主义的立场：像庇隆和瓦加斯这样的领导人可能在

^① Marina Gusmão de Mendonça and Marcos Cordeiro Pires, *Formação Económica do Brasil*, Sao Paulo: Thompson Learning Ltd., 2002, pp. 263 – 265.

^② Raúl Prebisch, *Hacia una Dinámica del Desarrollo Latinoamericano*, México D. 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63, p. 94.

^③ 同样，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边缘地区，如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也有类似情况。

其生命中的某个时刻被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所吸引，但他们最终认为自己的政治是从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中解放祖国。从瓦加斯和庇隆的言论中可看出这一点。瓦加斯在1954年自杀时留下遗嘱：“国际组织的地下运动与国内的反革命团体相互勾结，反对劳工保障制度。”^①而庇隆在1945年对军队讲话时这么说：“一位大人^②这么告诉我（当然，以更花哨的语言）：如果我交出了这个国家，那么只需要一个星期，我就能在某些国家成为最受他们欢迎的人。我这么回答：如果这就是代价，那么我宁愿成为最默默无闻的阿根廷人，因为我不想由于在国内成为一个狗娘养的（很遗憾我用这种粗话）而在其他地方受人欢迎。我们要么拯救国家，要么和国家一起沉没，但我们不会把它交出来。正如你即将看到的，有些人总是交出这个国家，而人人皆知他们就会这么做。这些人包括那些资本大亨，他们赚钱的方式就是出卖国家；还有那些为外国企业服务的律师，他们的目的就是嘲笑并出卖国家；在某些大使背后，有一些人与他们目标一致，就是打击捍卫国家的我们。还有人组织这类反对行为。一场反革命正在进行，我们必须阻止它，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斗争20年才能获得政治独立，我们就不会愧对我们的祖先，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再斗争20年以获得经济独立。没有独立，我们将永远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③

其次，鉴于前面描述的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拉美的民粹主义运动需要依靠工人阶级，要给予工人广泛的社会福利，继续加强工会组织联盟。这与纳粹组织在欧洲压制工会的行为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德国的公会组织明显试过去与新兴的纳粹政权合作。^④毛主义也曾被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特别是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几年。从1966年开始，毛泽东试图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年）绕过中国共产党的现有领导层，直接向群众和青年发出指示。这同样与拉美民粹主义无关，因为首先中国和拉美的社会基础和经济结构从根本上就不一样。正如前文所说，拉美政府严重依赖国家对外汇资源的控制，在阿根廷和巴西，外汇是由地主阶级控制的农产品出口提供；在墨西哥，外汇资源在很大程度上由石油出口行业提供。中国则正好相反，

^① Marina Gusmão de Mendonça and Marcos Cordeiro Pires, *Formação Econômica do Brasil*, São Paulo: Thompson Learning Ltd., 2002.

^② 庇隆暗指的是时任美国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1945年5—7月）斯普鲁伊尔·布拉登。

^③ Rodolfo Puiggrós, *Historia Crítica de los Partidos Políticos Argentinos*, Buenos Aires: Hispamérica, Vol. 3, 1986.

^④ Eric Hobsbawm, *Historia del Siglo XX*, Barcelona: Crítica, 1997, pp. 139–141.

国家完成了激进的土地改革，扫荡了地主阶级的势力。所以，中国资本积累的本质，与拉美“民粹主义的工业化不完全”没有相似之处。

再次，拉美各国政权在自由民主的框架内逐步制度化。在阿根廷，军政府在1943年夺取国家政权后，庇隆巩固了自己的个人权力，并于1946年创立了庇隆党（即后来的正义党），在那之后一直组织自由选举。巴西是个例外：最初，鉴于瓦加斯政府的社会基础脆弱，新上台的瓦加斯总统在1937—1945年间以个人独裁统治国家，直到他任职的最后一年才创立了巴西劳工党，仅仅几个月后该党便解散。在墨西哥，革命党自1929年以来就是一党独大，政治进程的制度化未发生过变化。这一特点成为问题所在，而这又与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有关。由于多阶级联盟是民粹主义运动的因素之一，他们不得不与反对党和企业界达成妥协，这种妥协违背了运动的最初目标。在50年代中期之后，对民粹主义政权抱有敌意的反对党和社会力量成为使用政治暴力和威权统治的主要势力。

四 民粹主义政党的特点

拉美民粹主义的基础是阶级联盟，各国工人阶级均参与其中（相比巴西和墨西哥，阿根廷的例子更为明显），一些中产阶级也加入联盟^①（在墨西哥也是如此，尽管程度较低），且由军官主导（阿根廷和墨西哥）。这一特点影响了民粹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在这三国的例子中，各国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有如下特点：涵盖面广、基础薄弱、常常变动且从未得到明确表述；在民粹主义运动的结构中，政党虽然被认为是必要的工具，但并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在这三个国家中，民粹主义政党并不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制度下众多政治组织中的普通一员，但在现实中它们最终还是成为普通政党之一。民粹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是运动本身，这意味着各种社会组织（农民组织、工会、企业和商会、妇女团体、军队）都可能参与进来，接受某个领袖的领导。如果政党最

^① 例如，1946年庇隆解散了阿根廷工业联盟，并试图在1952—1953年间以新成立的“工业邦联”和“整体经济邦联”取而代之。“工业邦联”意在代表工业资本家的利益，而“整体经济邦联”则将政体结构内所有的企业界势力重新组织。后者是为了建立全国性的、服从于政府的中产阶级组织的官方尝试，但这一尝试惨遭失败。1955年，军方重新成立了阿根廷工业联盟，视其为合法组织，此后“整体经济邦联”只能代表社会一小部分群体。Dardo Cáneo, *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pp. 141 - 188, 1984.

终成为民粹主义中最核心的因素，那么，如上文所述，这是政权必须达成的妥协，另一个原因是民粹主义政策巩固了各国的社会经济转型。

在“最初”的民粹主义构造中，领袖设法解决社会矛盾、平息不同诉求间的竞争，而运动的下层则毫无纪律。这导致民粹党最终变成了广泛的群众组织（也许巴西是例外），内部存在多条不同的政治路线。例如，在阿根廷，庇隆主义运动的参与者包括天主教徒、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右派分子，在1955—1976年期间他们经常互相争斗。在巴西，瓦加斯不仅在1945年创建了巴西劳工党，而且还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后者代表地主阶级精英的利益。

在巴西和阿根廷，政治反对派都不得不依赖军人推翻民粹主义制度。在阿根廷，整个民粹主义时期内，工人阶级对庇隆主义的认同感没有改变过。这对其他政党而言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政党是激进公民联盟（UCR），这个党基本代表城市中产阶级的利益。在1958—1962年期间，激进公民联盟赢得选举并统治了阿根廷，并在1962—1966年期间（其中有一次短暂的军方干预）连任。两任激进政府在完成其任期前就都被军方推翻了。不过，1958年和1962年的选举过程不是自由的，因为庇隆主义派被禁止参加。1958年（由阿图罗·弗隆迪西总统领导）和1962年（由伊图里亚总统领导）上台的两任激进政府之所以被推翻，原因恰恰是它们曾试图让庇隆主义党合法化，从而使政治进程正常化。有趣的是，激进公民联盟在1955年曾支持自由革命党，所以，庇隆主义确实让激进公民联盟处于两难困境中。实际上，1955—1983年间军方事实上扮演了阿根廷政治制度中的第三方^①。在巴西，政治动态的发展情况类似，社会民主党和巴西劳工党先后将库比契克（1956—1961年）和古拉特（1961—1964年）送上了总统的位置。1964年，古拉特被另一场政变赶下台，巴西建立了长期的军人专制制度并一直延续到1985年。

在墨西哥，革命的“制度化”意味着民主结构在理论上实行多党选举，而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唯一大党在这一体系内运行。在实践中，革命党成功地赢得了所有的选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2000年。多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机制使得这种制度化得以延续，包括将总统任期限制在6年之内（不允许再次当选），而总统习惯在离任前将其接班人亲自指定为该党的正式候选人。此外，卡马乔在继卡德纳斯之后担任总统时，成功地处理了党的内部矛盾，缓和了

^① Marcelo Cavarozzi, *Autoritarismo y Democracia (1955-1983)*,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92.

前任采取的一些最激进的措施，包括放缓过去4年中的土地集体化倾向。这产生了两项结果：一是缓解了军方对于革命可能激化的担忧；二是激发了中小农阶层的活力，这个阶层能成为社会力量中的缓冲，部分对抗地主阶层。中小农阶层围绕着国家行动党（成立于1939年）组织起来，并获得了天主教会的积极支持和影响。革命制度党政府还实施政策积极支持城市企业界，赞助设立新的商会。最后，1911年的人民起义这一先例不应被置于框架之外，因为如上文所述，虽然阿根廷和巴西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很得民心，但它们从未公开挑战地主阶层的实力。^①

民粹主义主张自己代表“全体人民”的所有利益，而历史上的自由主义政党只代表部分阶级的利益，所以民粹主义不仅不同于自由派政党的政治框架，也不同于欧洲共产党的政治框架。欧洲共产党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之下，并从这一重大事件中领悟到“组织一小部分合适的、有希望夺取国家政治权力的团体”的重要性，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这就是雅各宾派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对列宁主义有相当的影响。^②民粹主义的政治组织也无法与欧洲共产党的前身即社会民主工人党相提并论。尽管社会民主工人党也是群众组织，能适应选举中的竞争，但它毕竟是起源于单一阶级的组织。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社会民主党派逐渐放弃“仅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身份时，这些组织与民粹主义派别之间的差距才开始缩小。有趣的是，庇隆主义党的直接前身是阿根廷劳工党（1945—1947年）。该党于1945年由持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的工会领袖正式成立^③，成立时间是在1945年10月17日庇隆在工人支持下再次赢得阿根廷统治地位的“决定之日”之后^④。新成立的阿根廷劳工党在组织上参考了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工党，也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细微调整。1946年，劳工党在选举方案中推出了以下政策。（1）政治领域，主张政治民主的完整实现也需要实行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让政

^① 比如，庇隆对待农业商会（即阿根廷农业协会）的态度更倾向于妥协和谈判。Dardo Cúneo, *Comportamiento y Crisis de la Clase Empresaria*, Buenos Aires: Centro Editor de América Latina, 1984, pp. 188 - 195.

^② Eric Hobsbawm, *Historia del Siglo XX*, Barcelona: Crítica, 1997, pp. 78 - 85.

^③ 两者的区别请参见 Julio Godio,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Corregidor, 2 vols, 2000.

^④ 这一关键事件奠定了庇隆主义的群众运动基础。当时，阿根廷工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大规模示威，要求释放胡安·庇隆上校，彼时庇隆正被其军政界同僚监禁，这些人担心庇隆担任劳工和社会保障秘书时（1943—1945年）曾积累了相当的势力。

治民主成为现实的最佳手段；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维护与世界合作的政策，同时为了人类的利益，克服排他主义；让妇女也享有政治权利。（2）经济领域，主张对公共服务和矿产实施国有化；国家对国有企业的借贷和税收给予优惠政策，对广大群众进行技术培训；合理规划农业经济，划分土地，消灭大型农业庄园；组建生产者合作社。（3）劳工政策领域，实施劳动力调整计划，以解决未来的失业问题，根据比例减少工作日，但不减少工资；确认每个工人有分享企业利润的权利，在全国设立强制性的最低工资；规范农业工作、工厂卫生监管工作，采取安全措施，避免职业风险等。（4）财政领域，实行累进的遗产继承税，对不将土地变成生产资料的地主征收累进的土地税。（5）文化和社会资助领域，扩大预防和治疗药物的分配制度，增加国家药店和医院，实行社会化医疗援助，建设农村聚集地卫生设施。

庇隆主义政府在选举胜利之后，基本上实施了这个方案。但是，阿根廷劳工党自身的政治生存却并不幸运。虽然该党的“组织结构图”并没有严格规定该党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但明确规定了劳工党选区的社会划界。劳工党于1945年10月24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成立，本质上是城乡工人的集合，目的是为全国劳动者阶级在政治上争取经济解放。劳工党由劳工工会、行会组织、政治中心及个人成员组成。决定加入该党的工会将成为其组成的一部分，其成员将自动隶属于该党，但工会内部明确表示希望被排除在外的人可自由参与政治。工人、农民、专业人士、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商界人士等都可以成为劳工党的积极成员。在任何情况下，劳工党禁止接纳具有反动或极权主义思想者及寡头。曾参与过有保守倾向的政党但不曾担任过领导职位者可被接受为劳工党成员。劳工党不可接受政府任何形式的、公开或私下的捐助，如果企业的捐助可能是为了设立对他们有利的法律法规而提供的，也不能接受。工党可以与另一个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团体签订协议或暂时结成联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寡头政党或团体签订协议。^①

阿根廷劳工党是帮助庇隆当选总统的政党联盟中的一部分，联盟中的其他政党包括激进公民联盟—复兴委员会（UCR-JR）和刚刚成立的独立党（PI）^②；庇隆于1946年2月在总统选举中获胜。然而，庇隆设想的未来政权组织模式并不是劳工党的组织方式，他的奋斗目标是只存在一个政党。

^① Julio Godio,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 Buenos Aires: Corregidor, 2 vols, 2000, pp. 835 - 842.

^② 独立党建党主要是为了代表军方的政治利益。

于是，他在1946年6月创立了单一革命党的组织委员会，解散了激进公民联盟—复兴委员会、独立党及劳工党。1947年1月，这个委员会正式成立了庇隆主义党，该党在庇隆总统的前两届任期（1946—1955年）内增长非常强劲，同时对反对派（如激进公民联盟和阿根廷共产党）公开表现出敌意。随着时间的推移，庇隆主义党更名为正义党，成为阿根廷政治制度中的众多政党之一，在1983年之后正常参加总统选举。这一方面与阿根廷社会的演变有关，因为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里阿根廷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为社会阶层向上流动和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这也与该党领导人个人政治观点的演变有关。庇隆在最后一届总统任职期间，于1973年呼吁社会达成共识，其姿态显而易见^①。不过，描述这一未完的过程超出了本文的范围。

五 结论

拉美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发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运动，它植根于拉美主要经济体的结构中。首先，民粹主义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是对这些经济体双重特征的回应：一战之后的拉美经历了早期的工业化进程，这一进程在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加速发展；在工业发展的同时，面向国外市场的农业和矿业初级生产也同步发展，这一结构特征有助于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民粹主义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局限性。其次，拉美民粹主义的特殊性也意味着，在建立跨区域研究或分析这一概念之前，必须在拉美内部进行比较研究。拉美三国的情况存在重要差异。在阿根廷，这次运动更多是基于工人阶级的参与，至今正义党仍然是一个经常参与选举的广泛群众组织。在墨西哥，虽然民粹主义很早就已形成并在农民革命爆发之后持激进立场，但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在这一运动的外部还是内部，城市社会力量的组织结构较弱，地主阶级的反对之声也较弱。这反过来有助于解释革命制度党的垄断地位，该党直到21世纪才不再主宰墨西哥政治。在巴西，工人阶级运动与政权关系较弱，这意味着该国的民粹主义在发源之时比其他两国更专制，其结果是1954年以后民粹主义的政治遗产显得微不足道。

（翻译 陈默；责任编辑 黄念）

^① Ricardo Sidicaro, *Los Tres Peronismos: Estado y poder Económico 1946 - 1955, 1973 - 1976, 1989 - 1999*, Buenos Aires: Siglo XXI, 2002.